

# 傅高义推动海外中国研究

□ 白 鹭

傅高义（1930—2020年）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一个犹太人家庭，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开始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开启了他的中国研究生涯，至1973年接棒费正清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扛起海外中国研究的领军旗帜。

## 潜心研究新中国发展历程

以20世纪中叶费正清推动成立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为标志，美国学者对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研究迄今已历六代。傅高义自1961年开始研究中国问题，1965年在哈佛大学开设中国社会研究课程，他的学生中，杜维明、高棣民等名字赫然在列，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美国著名“知华派”学者。也很好传承了傅高义的学术思想。1963年，傅亲往香港生活了一年，以对岸的广东为研究对象，悉心观察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治理下广东的发展情况。1969年，他写就《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当时在美国及西方反响较大。傅高义坦言，“我们的目标不是对共产主义提出批评，而是努力客观地去理解它，去认识这个社会的治理和发展。”1987年，傅高义再次前往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潜心调研7个月，走访70余个县，并于两年后完成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这是外国学者全面研究和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本专著。书中对广东改革开放的背景、动因、进程及前景进行了系统论述，与20年前的那本《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

1968）》接续、呼应，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发展史。1995年，傅高义再度出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结合此前在美国政府工作的短暂经历，他改变以往只关注学术的传统做法，积极促成与中美日等国政府、政党、企业的合作，注重履行“教育公众”的责任，向世界广泛推介东亚中心及其本人中国研究的成果，客观上推动了海外中国研究纵深传播。2011年，他花费10年时间写作的《邓小平时代》（英文版）一书出版，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述，展现了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转型的历史变局和内在逻辑，仅在美国，就获得了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在内的6项大奖。该书出版后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 亲身经历中美关系变迁

1968年11月，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傅高义就与费正清等“知华派”学者联名给他写了一封密函，对加快与新中国建交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和政策建议。由于同为哈佛教授及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成员，傅高义与时任国务卿基辛格往来密切，不仅为后者提供咨询，甚至参与推动了著名的“乒乓外交”。1971年，基辛格专门到哈佛，向傅高义等学者咨询怎样跟中国打交道，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1973年，傅随美国国家科学院代表团访华，这是到访新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学术代表团。1993—1995年，傅高义受约瑟夫·奈之邀进入白宫，成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东亚事务官，其间与中方有关部门及官员建立了密切交往联系。卸任后，傅高义重回哈佛。在他领导下，东亚研究中心

“差不多成了美国政府亚洲事务部门在波士顿的分部”。

20世纪80年代末，中美关系陷入困境时，傅高义挺身而出，批评美政府中断与华经济文化交往是短视之举，敦促两国恢复正常往来。他全面客观地分析帮助美国社会化解对中国的偏见和敌视态度。事实也证明了他的长远眼光，在度过了那段困难期后，中美双方以更加迅猛的势头恢复并加强了在各领域的交往。20世纪90年代末，美右翼人士再度抛出“中国威胁论”，主张对华遏制政策。关键时刻，傅高义推出了新书《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对主张全面对抗中国的思想进行了有力驳斥，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领域保持全面合作，美应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入新时代，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贸易战，中美关系陷入低谷。2019年7月，傅高义联络百位美知名学者及前外交官，亲自执笔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致特朗普总统及国会的公开信，称敌视中国对美无益，“最终或将孤立自己，而不是北京”。两个月后，他又亲赴纽约，在华美协进社举行的对话会上大声疾呼，中国并非美国的敌人，所谓中美“脱钩”不可能实现。2020年4月3日，傅高义又与90余位美前政府高官和专家学者联名发表了题为《拯救来自美国、中国和全球的生命》的声明，呼吁疫情危机是中美合作的好机会，他多次指出，中美关系遇阻的部分原因是美国人不知道怎么应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中美两国要从建交以来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还是要保持接触，加强对话，谈判解决双边关系中的问题。回首中美关系多年风雨，傅高义不仅仅是见证者，更是践行者和推动者，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了不懈努力。

## 推动海外中国研究蓬勃兴起

在傅高义等一批学者近半世纪的努力推动下，海外中国研究从传统的汉学向“当代中国学”乃至“中共学”逐渐演进，研究领域、对象、内容、学科架构及研究方法等日益完善细化。梳理过去5年美国30余所大学的近千篇中国研究博士论文，研究领域涉及百余学科，跨学科、多元化渐成海外中国研究的醒目标签。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而深刻，中国知识生产的“世界化”，以及“众学治一学”的海外中国研究，对我们最重要的价值意义，在于为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可能和契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是斯诺、谢伟思、费正清等一批有识之士不顾个人安危来到中国、来到延安、来到华北，介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把一个真实的中国首次展现在世人面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又是傅高义等海外学者亲赴中国调查研究，客观记录下中国的发展历程，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上接1版头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和全国一样，安徽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三五”期间，安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一以贯之实施五大发展行动计划，破除了一大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关心关切的难点问题

题，办成了一大批对安徽长远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要事，经济总量向着全国第一方阵迈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交出了一份让党中央放心、人民满意的优异答卷。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从党的非凡历程中把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推动安徽各项

事业爬坡过坎、开拓前进。要提高斗争本领。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认真学习共产党人应对危局困境、不断攻坚克难的历史，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要发扬革命精神。始终牢记革命理想高于天、崇高精神永不过时，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深挖安徽红色资源，从新四军精神、大别山精神、渡江精神、小岗精神等精神谱

系中感悟使命、汲取力量，让革命薪火代代传承。要用好历史机遇。立足安徽省情，着眼长远发展，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机遇，用足放大国家实验室、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政策效应，聚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三地一区”，全面开启经济强、百姓富、生态美的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上接1版二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展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对农业支持保护政策进行了调整和完善。目前，已建立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多元化的补贴机制，农业农村改革稳步推进。在此基础上，党中央提出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 论足珍贵的历史经验

回顾历史，我们党在农村工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不忘初心，不断探索，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一是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创新。依靠农民、为亿万农民谋幸福一直是我们党的重要职责，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都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和农村工作，根据国情民情确立不同时期农村工作重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融入革命洪流，为新中国成立提供了重要力量。1978年以来，党中央出台了50余个有关农业农村工作的文件，围绕土地制度、经营体制、扶贫、乡村振兴问题指导年度工作。确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规定了土地承包期，并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作出了“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的重要论断，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方针。连续出台“中央一号文件”，指导年度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

和激励约束机制。实施耕地重金属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地表水过度开发和地下水超采的综合治理等工程，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加快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乡村生态建设。

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精准扶贫的实践，积累了可供各国借鉴的经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补齐“三农”短板，确定鲜明目标导向，推动农业农村农民与国家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

二是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保障涉农资金投入。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农业农村的发展离不开财政资金的支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最大限度实现了对“三农”投入的统筹。随着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增强，财政支农范围迅速扩大，由1978年的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科技三项费用等支出扩展至“三农”各领域，国家财政农林水支出由1978年的151亿元增至2020年的2.39万亿元。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不断丰富和完善，形成了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农产品价格支持、农业生产补贴、生态补偿等四大政策体系以及政策法律保障机制，我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支持保护之路。

三是坚持调动农民积极性，激发农村内生动力。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的各项农村政策都以调动农民积极性为出发点。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土地制度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让农民吃上长效“定心丸”；农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农产品的自由处置权；出台粮食最低收购价、重要农产品临时收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措施，构建了农业风险化解机制；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广社会化服务，通过土地流转、提供代耕

代种等生产性服务，提高了规模化组织化程度和集约化水平，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生产，农民有了获得感。实践证明，农民有了尊严，农业才有奔头；农民有了积极性，乡村才能振兴。

四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增进民生福祉。上学、看病、养老等问题是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以往城乡公共服务中的短板。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经过多年努力建立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基本实现了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和农村学校寄宿条件，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等，以提高农民素质、培养农村适用型人才。全面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基本药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起了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网，使农民老有所依，解除了农民后顾之忧。在农村建设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开展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活动，丰富农民业余生活。惠民利民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保障跃上新台阶。有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亿万农民的创造精神，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今日的乡村必将成为未来的幸福美丽家园。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原副司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

一项人口预测数据显示，到2050年发达国家年龄在25岁到64岁的人口将比2020年减少18%、即1.2亿人。各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引发劳动力人口锐减，劳动力短缺越来越成为困扰各发达国家的一大难题，成为危及各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制、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为应对人力不足及其引发的问题，各发达国家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应对之策，可以引以为鉴。

## 尝试削减社会福利

受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发达国家适龄劳动力人口在减少；另一方面，人口寿命的提高使老年人口大幅增加——到2050年，超过65岁的老人将增加38%，即9500万，超过80岁的老人将增加91%，即6100万。

发达国家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导致其社会保障体系的崩塌。因为，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几乎都是依靠代际支付来维持的，即通过募集年轻人的钱来供养老年人。当人口金字塔底座夯实宽阔时——年轻人多于老年人——这些保障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运行。在发达国家，年龄介于25岁到64岁的人口同65岁以上的人口之间的比例从1960年的5.7:1下降为1990年的4.16:1。在过去30年间，这一比例又下降到2.76:1。如果这些国家人口结构延续这种变化趋势，这一比例在2050年将降至1.65:1。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将无法以目前的交费水平维持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其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崩塌。

应对劳动力短缺引发的这一问题，法国尝试推行养老金改革、削减老年人的福利，结果引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罢工活动。罢工致使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和巴黎大众运输公司（RATP）的运营陷入瘫痪，给这两家公司造成了超过1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随着人口日益老龄化，保障老年人的养老金、社会保障以及医疗保健的任务愈发艰巨。

## 充分挖掘老年群体就业潜能

人口老龄化是造成劳动力短缺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努力挖掘老年群体的就业潜能，成为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重要突破口。近年来，深受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困扰的日本，在挖掘老年群体就业潜力弥补劳动力不足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日本厚生省的数据显示，受日本全境人口减少的影响，日本劳动力持续萎缩。如果女性和老年人就业形势没有显著改善，到2040年前日本劳动力将比2017年减少两成。然而，日本此前力推的“女性经济学”目前来看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日本女性的就业率早在2013年就超过了美国，2018年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甚至超过了70%，丝毫不逊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创历史新高。鉴于此，日本积极探索如何挖掘老年群体的就业潜能，不断促进老年雇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一方面，通过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和立法逐步延长劳动者工作年限。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日本政府通过修改《高龄者雇佣安定法》、开展有关禁止就业年龄歧视的立法工作等举措依法依规处理老龄化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保障了高龄者群体的就业权利，提高了高龄者群体的工作积极性，有效缓解了劳动力短缺，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促进健康老龄化，打造“终身劳动”制度。为充分利用老年劳动者长年积累的经验和技术，鼓励有意愿且身体健康的老年人继续工作，日本多措并举完善老年雇佣制度。一是继续推动健康老龄化措施，通过完善老年人医疗护理保障服务体系、推进“健康日本21计划”等举措保障老年人健康，为推进老年雇佣制度夯实基础。二是打造“终身劳动”制度。在长寿老人不断增多、劳动人口减少的背景下，日本通过扩大缴纳厚生年金的范围、延长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以及探讨延长公务员退休年龄的制度等方式，努力打造“终身劳动”制。

# 应对劳动力短缺发达国家怎么做

□ 赵纪萍

## 增加移民填补劳动力缺口

世界人口分布的不平衡，造成了劳动力人口数量的两极分化。一方面，发达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到2050年发达国家将面临3.8亿的劳动力缺口。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之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低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甚至有些国家出现了“青年膨胀”现象，即年轻人比例过高。在发展中国家，从现在到2050年，适龄劳动力人口将增加17.5亿。如何为这些适龄劳动者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则成为困扰当地决策者的一个难题。

如果各发达国家增加移民，不仅可以解决他们自身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危机，而且有助于缓解一些国家因为“青年膨胀”现象而导致的就业危机，可谓是一举两得。然而，发达国家对移民的巨大需求似乎与其维持社会凝聚力的政治需求存在冲突。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大部分民众并不欢迎移民，他们认为不受控制、大规模的移民将破坏他们共有的归属感和传统。

30年前，我们无法想象日本会谋求与尼泊尔等发展中国家达成吸引临时移民的双边协定，毕竟日本以其限制性移民政策和文化保护而闻名。但是，日本目前的适龄劳动力人口与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还不到2:1，传递出严重的人口危机信号。几乎每个发达国家都在朝着日本的方向发展，因此他们将不得不考虑放宽对移民的限制，通过增加移民填补劳动力缺口。

“积分制”移民是其中的一种解决方案。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首创“积分制”移民政策，之后澳大利亚、丹麦、日本和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采纳了这一移民方案。不可否认，“积分制”移民制度为这些国家带来了相当数量的外国工人，而且没有造成这些国家内部的紧张局势。但是，这种移民模式带来的是大量高技能工人和高端人才，并没有满足这些国家对中低技能工人的需求，而且还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人才的流失。

相比之下，新加坡和海湾国家采用临时移民项目，既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又能够满足发达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些国家的临时移民项目设置的准入门槛很低，但是加入临时移民项目的外国工人只获得临时身份，几乎没有机会获得永久居留权和公民权。这种模式成功地维持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凝聚力，并为民众维系了高水平的社会福利。然而，这种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临时移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在缺乏政府监管的情况下移民受到剥削或虐待的情况时有发生。

